

# 从小说叙事学到符号叙事学

赵毅衡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叙事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 随着当代文化的“叙事转向”,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应打破传统叙事学侧重于小说和电影这一倾向, 更多的社会人文学科都应成为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因此, 叙事学应实现跨问题、跨媒介和跨范围研究, 而作为研究一切包含叙事成分的文本的叙事学, 符号叙事学将成为当前叙事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叙事; 中国叙事学; 符号叙事学

**作者简介:** 赵毅衡(1943-) 男, 广西桂林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意义理论、符号学、叙事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CO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87(2021)05-0069-06 收稿日期: 2021-04-25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1.05.010

## 一、叙事的普遍性

叙事是人类表意行为的共同普遍方式, 至今这是人类文明的“共相”, 即凡是人类文明, 无论处于何种形态, 均有其意义方式, 而动物界, 无论何种高级物种, 却没有这种能力。巴尔特《叙述结构分析导言》的最后一句说得有趣而隽永: “差不多在相同时间(约三岁左右), 幼小的人类‘发明’了句子, 叙述, 俄狄浦斯故事。”<sup>①</sup> 婴儿不会讲故事, 正如人类在发明语言符号之前也难以把事件串联成一个因果一时序的组合。而一旦文明开始出现, 故事就成为道理的载体, 带来痛苦, 也带来秩序。

因此, 叙事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面对现象世界以及想象中的大量事件, 人类的头脑可以用两种方式处理这些材料: 一是用抽象思索求出所谓共同规律, 二是从细节中找出一个“情节”, 即联系事件的前因后果。不用这两种思维贯通方法, 经验就无法作贯通性的理解, 就会散落成为碎片, 既无法记忆存储, 也无法传达给他人, 我们的存在就会落入空无, 堕入荒谬。叙事也是人类把世界“看出一个名堂、说出一个意义”的方式(“Human beings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by telling stories about it”)<sup>②</sup>, 是人类在世存在的基本组织方式。文化学者很早就注意到, 叙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途径。利奥塔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中提出“泛叙事论”, 他认为人类的知识, 除了“科技知识”, 就是“叙事知识”。<sup>③</sup> 他的意思是所有的人文社科知识, 从本质上说, 是叙事性的, 是讲故事。

在利奥塔之前, 萨特早已强调, 人类的生存等同于讲故事: “人永远是讲故事者: 人的生活包围在他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 他通过故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 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故事。”<sup>④</sup> 哲学家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招标课题“当今中国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20&ZD049)

① 罗兰·巴尔特《叙述结构分析导言》, 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 第438页。

② Bruner, Jerome S.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29.

③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 关于知识的报告》, 岛子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年版, 第74页。

④ Jean-Paul Sartre. *Nausea*, New York: Penguin Modern Classics, p.12.

罗蒂把所有的哲学讨论分为两种“分析哲学”与“叙事哲学”。<sup>①</sup>其后,十位哲学家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结果最终合成一本文集即《分析哲学与叙事哲学》。<sup>②</sup>叙事文本,就是包含有情节变化的符号文本。随着当代文化的“叙事转向”,近年来各科学者们的看法也在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人文学科,都开始以叙事为研究方法或对象。所谓符号叙事学,讨论的是所有叙事体裁的共同规律。这就意味着打破传统叙事学研究的自限,不再局限于研究小说加电影。叙事学将超越狭义的文学叙事,开放式地面向所有领域。因此,符号叙事学,研究的是一切包含叙事成分的文本的叙事学,它也是很久以来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有一些学者多年来已经朝这方面努力,他们的理论值得我们回顾。

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一门跨媒介的覆盖所有叙事体裁的符号叙事学理论已经呼之欲出。固然至今见到的各种方案比较散乱,但学出多源,也有很大好处,可以多元发展,避免模式单调,定于一尊。

## 二、近年来中国叙事学的繁荣

中国叙事学近年的突然兴盛,是国际叙事学运动的重大事件。诚然,中国叙事学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已经萌生,并且出现了一批重要著作。在新世纪中国叙事学继续发展,但是当时的叙事学活动,主要是国外叙事学著作的翻译,以及其成果的介绍,从事叙事学的学者,大部分是各大高校外语系的教师。这个局面是天然形成的,不是有意为之,因为当时的学术资源大部分来自国外。当然,这个借鉴时期也是必要的。21世纪头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新叙事理论译丛》(申丹主持),该套丛书共有十多本论著,为中国叙事学的兴盛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这个时期的工作在2010年出版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申丹、王丽雅著)中得到总结。翻译介绍工作,从那个爆发时代起,至今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在叙事学书籍总量中,占比渐渐减少。由此可见,有关叙事学研究的世界文化共同体的优秀成果依然受到我们重视,但依赖性逐渐减少,这是中国叙事学成熟的标记。

2010年以来的十二年期间,中国叙事学进入了大繁荣时期。其中原因,我个人认为是学界突然发现中国叙事学遗产极为丰富,足以让学界意识到叙事学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事业,而不是所谓的“西学”。2009年杨义出版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对学界震动极大。此书表明作者在细读我国古代典籍过程中,发现了不同于西方叙事的我国叙事学传统,即叙事与历史的同构,从而引发不同于西方叙事中的结构、时间、视角、意象与理论原则,进而为我国自己的叙事学体系打开了大门。继杨义之后,众多学者为此做了更加系统的梳理,大部分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如李贞慧主编的《中国叙事学》(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而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文体之间互动互证方面做出最大成就的,莫过于赵宪章花费十年的心血而主编的《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此书长达8卷10册,可以作为这个领域留给后世的里程碑著作;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努力最后都被王瑛总结于2002年所出版的《叙事学本土化研究》一书中。可以预见,这方面富于成效的工作将延续下去。

但是学说的建立,不能仅局限于整理中国遗产,现代学者必须提出现代观念。中国学者为叙事学的中国学派的理论做了重要的工作。如徐岱于2010年出版的《小说叙事学》,赵毅衡于2012年出版的《广义叙事学》,傅修延于2015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邓颖玲于2013年出版《叙事学研究:理论、阐释、跨媒介》,以及谭君强于2018年出版的《叙事学研究:理论、阐释、跨媒介》等,这些著作都对这十年中国叙事学的发展做了很出色的总结。除了总体的叙事学研究,这一阶段最大的成果可能是叙事学各种分课题的阐发。龙迪勇出版于2015年的《空间叙事学》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文库”;张新军的《可能世界叙事学》(2015年)开拓了中国学者在虚构理论方面的大量工作;余杰的《开端叙事学》(2015年)深入研究叙事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共同问题,其细致分析值得推崇;申丹在2019年出版的《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将叙事研究延伸到“文体风格”这个非常重要的人文领域;而黄鸣奋

<sup>①</sup> Rorty Richard.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Narrative Philosophy*. Irvin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sup>②</sup> Sorell, Tomand G.A. Jagers(eds).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Narrative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的《位置叙事学》(2017年)则为叙事学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云燕的《认知叙事学》(2020年)开辟了叙事学与认知学相结合的大有希望的新领域;而傅修延于今年出版的《听觉叙事研究》则在文字、语言、视觉之外,为世界叙事学运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亚体裁研究畛域。

也许这十多年中国叙事学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应用叙事学”,叙事学只有应用于各种具体领域,其解释潜力才得到最大的考验。以前叙事学长期应用于外国文学作家或作品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则大量应用于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研究(如李自芬出版于2009年的《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而这十余年叙事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一系列小说之外的问题范畴。2012年程维的《叙事学视阈下的新闻编译》推进了曾庆香在2005年开始的《新闻叙事学》相关研究,将新闻传播这个重要的现代叙事领域纳入到叙事学理论的观照视野之中。乔国强的《叙说的文学史》(2017年)则是一种元叙事,研究的是关于叙事的叙事;宗争于2014年出版的《游戏学:符号叙事学研究》对电子游戏这样当代流行的叙事样式做了具有穿透性的研究;刘云舟的《电影叙事学研究》(2014年)重点研究影视这种对当代最重要的叙事样式;胡一伟的《戏剧:演出的符号叙事学》(2019年)却回过头来对戏剧这种最传统的叙事体裁做了重新理解;饶广祥的《品牌与广告:符号叙事学分析》(2020年)侧重于处理广告这种现代文化的新叙事样式;赵禹平的《纪实的边界:论纪录片的“摆拍”与报告文学的“虚构”》则揭示了当代文化中叙事样式的细微差别。应用叙事学的工作有许多人在做,将要成书的有倪爱珍的“陶瓷图像研究”,方小莉的“梦叙事研究”,朱林的“民族志仪式研究”,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成果接近成熟。此外,设计叙事、展览叙事、旅游叙事、数字社交媒介叙事、教育叙事等许多方面,已经有相当成绩积累,必然有所突破。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近十多年叙事学的成就,表明叙事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在世界叙事学运动中,应当已经独树一帜。

### 三、符号叙事学

通过上面的简略回顾可以看出中国叙事学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这一趋势有别于世界叙事学运动的一个独特倾向,即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十年中,远远溢出了小说/影视这个叙事学传统领域,走向跨文体、跨媒介、跨范围的“泛叙事学”。一些学者已经设法给这个趋势赋予不同的名称,例如“一般叙事学”“广义叙述学”,甚至以最广泛的意义载体命名之,称为“符号叙事学”或是“叙事符号学”。

符号就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携带,任何符号也必然携带意义。符号经常组合成本表达合一的复杂的意义,这种组合我们称之为“文本”,而一旦这种文本组合表达的意义中有情节变化,这种文本就成为叙事,不然只是描述或陈述。此外,要成为叙事学研究的对象,这种文本中的情节变化,必须卷入人物,或是“拟人物”,不然描述一场地质演变,或陈述一次化学实验,都会成为叙事学研究的对象,那就会让叙事学越出人文学的范畴,冲淡叙事学的人文哲学底蕴,实际上叙事学的附在讨论,也无助于地质学、化学、物理学、医学等学科的研究,除非讨论“叙事治疗”“教育叙事学”等卷入人类心灵活动的编辑学科。虽然叙事学界从来没有人讨论过这样一个叙事定义,但是从上面列出的中国叙事学家的成果来看,没有一个人越出这个范围,看来这是一个自然的共识。

叙事学与符号学的结合,最早不是中国学者提出的,西方学者早就心有所动,不过他们没有动手做成一个清晰完整的体系,只是提出了这个可能性。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在这个方面“动口不动手”,没有几篇论文,更不用说系统的专著。因此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处于领先地位。应当说,早期的形式分析理论家,实际上是把叙事学当做符号学的一部分在讨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不必细分的二合一的学术。巴尔特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著文讨论符号学与叙事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到1970年出版的《S/Z》就用符号学方法来解读叙事;托多罗夫的《十日谈语法》试图寻找叙事情节的基本规律;布瑞蒙的《叙事逻辑》也是用符号学的关注方式来讨论叙事形式。在他们笔下,这种混合是很自然的,无需辩护的,也无需单独声明,说穿了反而似乎有点小题大做。

但随着叙事学的逐渐成熟和独立,把二者关系说清楚也变成一件必要的事。最早提出建立这一学

科的是法国叙事学家兼符号学家 A.J. 格雷马斯,他的相关文章最后结集为《叙事符号学与认知讲述》<sup>①</sup>;利科在1984年出版的《时间与叙事》第二卷中用专门一节来讨论普罗普、布瑞蒙、格雷马斯的学说,称他们的学说为“叙事的符号学”(Ricouer 1984);恰特曼等人则认为要解决叙事学的深层问题,必须进入符号学;而卡勒清楚地说“叙事分析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分支。”<sup>②</sup>这些学者们的共识是认为叙事学就是关于叙事的符号学,例如让-米歇尔·亚当明确指出“叙事学可以被认为是关于符号的总体科学符号学的分支。”<sup>③</sup>但是建立适用于任何符号的叙事学,呼声虽然高,却一直没有一个成型的体系,因此这个学科并没有真正建立。与此同时,叙事学界也意识到必须扩大叙事学的研究范围:米克·巴尔很早就指出存在两种叙事学认为“文学叙事学属于诗学,非文学叙事学属于文本学”<sup>④</sup>;里蒙-基南纠正她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非文学叙事学属于符号学”<sup>⑤</sup>。他们都体会到,只有广义的符号叙事学才能处理一般叙事研究。近年来,国际学界都感觉到这一任务已经迫在眉睫,不约而同地做出应对:国际“叙事文学研究协会”于2009年改名为“叙事研究学会”(ISSN);而欧洲叙事学网络(ENN)于去年出版了大规模的网络版“活的叙事研究词典学手册”(A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鼓励学者参与网上补充扩容。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切实的新方案,逐渐接近了“符号叙事学”这门理想中的学科。如瑞恩提出建立一门“跨媒介叙事学”(transmediac narratology);欧洲学界关于“自然”与“非自然”叙事的辩论触及了各种叙事的根本性特征。<sup>⑥</sup>中国学者近年对叙事学研究体裁扩大的贡献也不少,例如傅修延与江西师范大学的叙事学团队关于各种特殊媒介(例如青铜器铭文与图案、牌坊、讖纬、茶艺)叙事的研究,已经向符号学方向推进。

叙事的符号学研究,并不打算抛开传统叙事学,相反,从符号学分析出发,在符号学共性背景上,传统的小说与新媒介叙事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会得到更清晰的理解;而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边缘”的体裁,现在已成为叙事研究的重要对象(如广告、游戏、体育、法律等),因此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学理模式的创建,将会为学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and 意义。

既然符号叙事学讨论的是所有叙事体裁的共同规律,为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必须把任何方式的叙事,根据它们的特征进行分类。诚然,过去有过一些对叙事体裁进行分类的工作,但是没有人试图对叙事的全域进行分类——“分类”是任何全域获得意义的第一步。

广义叙事符号学,对当前多媒介文化的各种类型叙事进行探讨,尤其是那些至今被忽视的体裁,如广告、游戏、微博、微信、展览、行为艺术,甚至梦境与错觉等。叙事就是内含情节的文本,我们的整个文化是与社会相关的表意活动的总集合。因此,各种叙事意义方式的汇合与冲撞,会出现很多精彩看点。

#### 四、符号叙事的伦理关注

许多学者认为近年批评界的重要趋势是“伦理转向”(Ethical Turn)。表面上看,语言转向与叙事转向是个文本形式问题,而伦理转向强调内容或意识形态,实际上,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麦康奈尔指出“你会听到(在书中读到,在电影中看到)别人的故事,那只是因为你知道,在一些基本的水准上,你也能成为,或将成为,那些故事中的英雄。”<sup>⑦</sup>叙事化不仅是情节构筑,更是借叙事的情节化彰显伦理目的。有不少学者指出,只有用叙事才能在人类经验中贯穿必要的伦理冲动:叙事的目的是意义,首先是道德意义。

① Greimas, A.J. *Narrative Semiotics and Cognitive Discourses*. London: Pinter, 1990.

② Culler, Jonathan. *In Pursuit of Signs: Semiotics,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Ithaca: University of Cornell Press, 1981.

③ Jean-Michel Adam. "Narrative enunciation in Perrault's Contes". *Francaise Moderne*, January 2012, Vol.80, Issue 1, p.55.

④ Bal, Mieke.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⑤ Rimmon-Kenan, Shlomith.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3, p.xi.

⑥ 弗卢德尼克·莫妮卡《叙事理论的历史》,见《当代叙事理论指南》James Phelan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 Frank McConnell. *Storytelling and Mythmaking: Images from Fil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59.

为什么叙事能达到伦理化的目的?因为在情节化过程中,主体意识不得不进行挑选和重组。生活经验的细节之间本是充满大量无法理解的关系,所谓“叙事化”,即在经验中寻找“叙事性”,在经验细节中寻找秩序、意义、目的,把它们编成情节,构筑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一旦情节化,事件就有了一个因果-时间序列,人就能在经验的时间存在中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叙事是构造人类的“时间性存在”和“目的性存在”的语言形式。情节将特定事件的诸种要素连为一体,构成道德意义。叙事性并不提取抽象原则,不把意义从时空背景中抽离出来,因为人与世界的特殊联系,就植根于故事的体验之中。<sup>①</sup>

哲学家罗蒂1989年出版的名著《偶然、反讽、友爱》指出了“叙事转向”的重大意义:基于“客观真实”的分析方法已经无法处理当代文化的困境。在当代社会,要达到道德目标,罗蒂认为只能通过“类似普鲁斯特、纳博科夫、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叙事。<sup>②</sup>叙事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它要求形式上的完整,引向道德上的完成,可以说,“叙事转向”的动力正是对意义推进和伦理诠释的完满之美的渴求。

从叙事学运动一百多年的发展史来看,叙事学是一项与实践结合得很紧的学说,尤其在小说的叙事方式研究方面,已经十分精微。自从电影诞生并且变成比小说影响力更大的叙事样式,电影的叙事学变得越发重要,但是实际上只是小说叙事学模式的延伸。电影的叙事学特征至今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太多。而当新媒介叙事诞生,游戏、新闻、广告、VLOG、微电影、漫威动画、流行歌曲,甚至图像、景观之类的叙事方式在我们生活中占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叙事学则是严重地落后于社会的叙事实践,这点亟待广义符号叙事学来解决。

叙事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大学科,但至今没有建立一套最基本的、各论家都能同意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近年来,叙事哲学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致力于该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逐年增多,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社会的飞速转型给各国学界带来的理论困扰,以及全球化进程所引发的各种文化问题都是促使人们对叙事哲学研究加以关注的原因。通过理论与思想层面的研究来解决实际问题,是各位研究者的心愿。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叙事哲学的研究,总体的局面是:分散讨论的多,总体的研究阙如;拘泥于某种方法的多,对材料和观念做仔细分析的少。综合性的研究往往是文集,文集的好处是集合各家之说,面多量广,顾及各种细节;不足的地方是面面俱到而缺少综合,没有一个复杂局面下的指导原则。而且理论方法上往往极为分散,没有一个贯穿性的论辩。这个问题已经被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但如果找不到一个作为总体支柱的理论,依然会无法对付当今文化转型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在数字时代,传统叙事文体的起承转合结构已经难以为继:最受大众欢迎的电视剧,竟然分集制作,结果是虎头蛇尾,许多电视剧拖得太长,成为“烂尾之作”;网络上的“超小说”(superfiction)应付费读者的需要而加章,可以长达百万字,到最后难以为继;有的网络小说可以让多人接龙,结果散漫无边;还有可以称为“聚合系列”的续作,每一集都在原IP上发展,似乎永远无法结束,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漫威电影系列”。

数字时代的这些叙事体裁有一个特点,就是很难做一个像样的结尾。而结尾是任何叙事在伦理上最重要的部分。所谓“好恶有报”在生活中不一定能实现,或者说在某一段时间中很难实现,但是在叙事作品中大部分必须有所实现,这是叙事作品的结构要求,观众读者的感情诉求,但也是叙事的伦理责任。如果结尾渐渐淡出甚至消失,那么这样的作品在伦理上会有所欠缺。

中国人善于历史叙述,司马迁说《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sup>③</sup>。各种叙述体裁,大部分有个惩恶扬善的报应结局,这样的《春秋》叙事,才能让“乱臣贼子惧”。所以普罗普的“民间故事情节类型”

<sup>①</sup> Polkinghorne D.E. "Narrative Configuration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 A. Hatch and R. Wisniewski, London: Falmer, 1995, p.5.

<sup>②</sup> Rorty Richard.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xvi.

<sup>③</sup>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85页。

研究,主人公“陷入圈套”“被追捕”“面对难题”,但最后总能战而胜之;格雷马斯的情节行动元模式论,主人公必然面对“反对者”及其帮凶,最后总能完成人生使命。这是因为叙述是一种“社群文体”,必须承担一定的社群责任:首先要让听者能懂、能感兴趣,而且要让听者得出伦理结论,尊崇社群的规范与期待。故事需要使人满意的结局,正是这种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如果一个时代的相当一部分叙事无法完成此功能,必定会给这个时代的思想带来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个相当实在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结尾无力困局”。这是一个当今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叙事学问题,而且会随着数字文化的强力扩展而更加明显,只是这个问题至今尚未有人认真讨论。笔者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叙事学不是已经成就大功了,恰恰相反,叙事学理论本身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时代对叙事学提出的新问题,远远超出已经解决的问题。这个学科等待着有心人来参与,来建功立业。

## 五、符号叙事学的前景

广义的符号叙事学发展至今,文献资料虽然丰富,讨论却相当散乱。尽管目前国内外已有多种论文集,但是进行理论综合的却并不多,以至于有论者认为至今尚没有这样一门完整的理论。自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的“叙事转向”,文化变型加速,社会的各种跨媒介叙事活动空前活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型的叙事方式。这是几千年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建立一个能应对当今文化巨大变化的广义符号叙事学理论,是当前人文社科研究的当务之急。叙事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和社会分析工具。先前的模式各有优点缺点,对问题各有思路与基本范畴。

叙事学在中国正在成为显学,建立广义的符号叙事学理论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文化剧变,迫切需要一支生机勃勃的叙事学研究队伍,来做开发性的研究。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博大精深,需要当代学者深入符号叙事学体系之中进行一种整合工作,融合中西的叙事思想,从而建构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体系。

当今,中国文化迅速冲进一个“高度传媒化时代”。我们对此局面及其重大历史后果,至今没有充分的理解;我们对多媒介叙事的生产和消费的规律,至今没有认真的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冲突中,有关“叙事权”的争夺,也越来越重要,“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前行的迫切任务。

国内外学界,在叙事学总体理论,在门类叙事学中,创见甚多。但是广义符号叙事学领域之大,留下的空白依然很多。一个世纪以来,对叙事学做出贡献的学者,来自许多实际的学科,例如广告叙事学、电影叙事学、叙事诗学、传播叙事理论、游戏学、人类学等。叙事学在这些应用领域迅速推进。要融合如此多门类叙事学的成果,是全国叙事学同仁必须携手完成的任务。

## From Novel Narration to Symbolic Narratology

ZHAO Yiheng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Narration is a common way for human beings to organize personal surviv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With the “narrative turn”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more and more scholars realize that traditional narratology should break away from the tendency of focusing on novels and movies, and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narratology should be more social humanities. Therefore, narratology should realize cross-problem, cross-media and cross-scope research. As a narratology that studies all texts containing narrative elements, symbolic narratology will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urrent narrat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narrative; Chinese narratology; symbolic narratology

[责任编辑 李 谦]